

姜德明 主编
纪申 选编

巴金书话

北京出版社

A large, expressive calligraphic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巴金' (Ba Jin), positioned vertically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序 言

姜德明

现在，书话这种形式已经非常习见了。特别是在读书界，所有爱书者几乎没有不喜欢读书话的。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诗话、词话、曲话古已有之，名著多有，唯有书话似乎是近六十年始为人们所用，并逐渐流传，终于为公众所认可。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书话的理解仍各有不同，在理论和实践上，既无统一的定义，写法上也各行其是。书话的形式也许还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的发展和探索，才能更臻完美，认识统一。

现在，人们对书话范围的界定还比较宽泛，多数人把凡是关于谈书的散文、随笔，包括书的序跋，甚至较短的书评，一律目为书话。或者说，书话本来就内容宽广，可以无所不谈，不必强求统一。

但，有些认识已经逐渐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也是事实。如，书话源于古代的藏书题跋和读书笔记，并由此生发、衍变而成。书话不宜长篇大论，宜以短札、小品出之。书话以谈版本知识为主，可作必要的考证和校勘，亦可涉及书内书外的掌故，或抒发作者一时的感情。书话不是书评，即不是对一本书作理论性的全面介绍、分析和批评。书话不能代替书评。

我常说，书话只要能够引领读者爱慕知识，并唤起他们爱书、访书、藏书的兴趣就好，不必过苛地要求它承担更多的繁重任务。

40年代初，我开始对新文学书刊发生兴趣。在课堂里无法满足的知识，只好到旧书摊前去探秘，开头是盲无所从，碰到什么是什么。一本曾孟朴的《鲁男子·恋》，曾经让我痴迷多时，误以为是新文学最伟大的小说。到了40年代中后期，突然发现唐弢先生写的关于新文学的书话，一下子顿开茅塞，好像找到一位引我入门的老师。我羡慕他的藏书丰美，那些充满魅力的版本一直诱惑着我。我采取的是笨办法，循着他书话中提到的书一一去弢访。读唐弢的书话，打开了我的眼界，如读一部简明的新文学史。

50年代中期，我由《人民日报》读者来信部调往文艺部，在袁鹰同志手下编副刊。他是一位放手用干部的好领导。我在工作中偶有所想，一般都能得到他的支持。当时，袁水拍同志已请西谛先生为我们副刊开辟了《书林漫步》专栏，那当然是书话。这个专栏得到了知识界的好评，可惜所谈的都是古籍，距离一般读者的兴趣稍远。为此，西谛先生后来有意

避开冷僻的版本，分别写了买书、分书、整书、访书等接近生活的题目。本来他还可以继续写下去，却因“反右派”、“大跃进”，以及他出访域外不幸遇难，这组文章遂成绝响。西谛先生为我们副刊刊载书话奠定了基础，功不可没。

60年代初，唐弢先生举家北迁。当他刚刚安好新居，我就贸然闯入，请他为我们写书话。他答应了，却流露出某种顾虑，问我：“现在还有读者对这类文章感兴趣吗？党报上介绍旧书版本会不会有人反对？”我打消他的顾虑，并同他一起商定，可以先从革命书刊和左翼文艺运动的书刊谈起，再一步步地涉及进步文艺，如文学研究会的诸大家和巴金等。所以，晦庵的书话一开张，便谈李大钊、鲁迅，以及国民党的禁书和革命者的伪装书。至于含有书斋趣味的藏书票、藏书印、线装书籍装帧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是在1962年，作者在出版《书话》单行本时临时补入的。如此谨慎，今天的读者也许会大惑不解。

在这以后，我又联系阿英先生写了近代文学丛谈，请陈原先生写中外读书小品，赵家壁先生写编辑忆旧，钱君彖先生写书籍装帧琐谈，李健吾先生写艺术短简，路工先生写访书见闻录，还有丁景唐、瞿光熙、胡从经等先生写的有关新文学的书话。以上有的虽然没有用书话的招牌，实际都没有离开书。我以为报纸副刊刊是发表书话的理想园地，不仅可以提高报纸的文化品位，也是普及文学史和培养读者艺术修养的极好方式。书话兴盛一时，到1964年强调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大批判”的时候就匆匆收场了。

“文革”前夕，我已沉默，静候批判。因为报社已经抛开

文艺部，背后整理铅印了十来种文艺部工作错误的专题材料，其中的两份，即关于唐弢的书话，以及读书随笔的。罪名之大、上纲之高已令人胆战心惊。到了“文革”开始，却又被“造反派”们当作“假批判、真包庇”，认为书话之类正是为30年代的反革命文艺黑线摇旗呐喊，是有计划的一个阴谋活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书话的兴衰，莫不与时代的政治起伏有关，这时候我才想起当年唐弢先生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

至今为止，人们都承认唐弢先生的书话影响最大，这不是偶然的。他在篇幅有限的方寸之地，能给人以知识和文采，表达出一个爱书人的品格，这不是任何一位作者都能达到的境界。1979年10月，他在编完《晦庵书话》时说：“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这样，我以为书话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他的经验已成为人们研究书话特点的重要依据。说他在书话写作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也不过分。

近代藏书家傅增湘的《藏园群书题记》、周叔弢先生的《自庄严堪藏书题识》、邓之诚先生的《桑园读书记》、马叙伦先生的《读书小记》、《读书续记》等，尽管偶然会间及掌故，重点仍在资料和校勘，有的已近于目录学的范畴，更不要讲抒情了。唐弢先生却强调文学因素，并把它理论化了，使枯燥的藏书题跋走出专门家的书斋，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这是后人不应该忘记的。当然，我们也不能机械地理解为书

话必得抒情，一定谈掌故。这要因书而定，不能勉强。以知识为主没有错，写得生动活泼一点也是必要的。邓之诚先生是以文史学家的眼光写书话的。1955年他在编完自己的《桑园读书记》后说，他的读书记以“提要”和“劄记”合成。“提要”是“撮其内容，使未读是书者稍明途径，且知某事见某书，为切实可用也”。“劄记”则“间附己见”，意在表述个人的观点。这也是经验所得，一家之言，是书话的另一种写法。近年，孙犁同志写的《书衣文录》，更一反传统藏书题跋的写法，甚至把与书本身全无关系的一时感触写在书衣上。但，没有人不承认那是书话，而且是思想深刻、别具一格的书话。

有人说最先用“书话”为题写作的不是唐弢先生，我认为这个问题不怎么重要。我也没有作过考证，只是在翻旧书刊的过程中，见到1937年10月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前后，阿英先生写过一组《鲁迅书话》；同年4月，他还在《青年界》第11卷第4号上发表了一组《红楼梦书话》。但，也不能就此断定最早用“书话”的是阿英。作家曹聚仁早在1931年8月15日出版的《涛声》半月刊创刊号上，便以《书话二节》为题了。同月22日出版的《涛声》第2期，他又发表了《书话·2》。如果我们有耐心去翻阅一下，1933年和1934年的《申报·自由谈》，那里还有另外几个作者，也在以“书话”名义写读书小品。书话在30年代曾经一度繁荣，丝毫也没有影响唐弢先生在书话创作方面总其大成的功绩和历史贡献。前人的实践我们都应当尊重。文学史上从来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会跳出一个伟大的天才来。

为了适应当前读书界的需要，也为了向读者提供一部系列的权威读物，北京出版社邀我来主编“现代书话丛书”。我认为这是出版家注重基础工程的举措，有利于长远的文化建设。经过筹划，现在推出了八位作家，都是撰写书话的大家，有过历史的贡献。

在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与各卷选编者及出版家进行了反复的磋商。时间并不充裕，这也可以说是一次紧张、团结的合作。我们想尽力做得完美一点，怕亦有不周之处。如有不当，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1996年4月于北京

目 录

序言.....姜德明（1）

第一辑

书.....（3）

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6）

我的“仓库”.....（10）

文中话书摘抄三十则.....（13）

信中话书摘抄十二则.....（47）

第二辑

《巴金自传》小序.....（61）

昭明版《巴金选集》后记.....（62）

《巴金选集》（十卷本）后记.....（65）

《巴金六十年文选》代跋

——致李济生.....（70）

《巴金书信集》序

——致刘麟同志.....（74）

谈《灭亡》（摘录）.....（76）

谈《家》.....（83）

谈《寒夜》.....（91）

谈我的短篇小说.....	(105)
谈我的“散文”.....	(120)

第三辑

说几句开场话（《自由月刊》）.....	(137)
编者的话（《自由月刊》）.....	(139)
告别的话（《文学季刊》）.....	(141)
复刊词（《文学季刊》）.....	(144)
复刊献词（《烽火》）.....	(146)
写给读者（《烽火》）.....	(148)
给读者（《烽火》）.....	(149)
写给读者（二）（《文丛》）.....	(151)

第四辑

《工女马得兰》译本序.....	(157)
读《木偶奇遇记》.....	(161)
《争自由的女儿》序.....	(163)
《生人妻》后记.....	(166)
《逃荒》后记.....	(168)
《雨夕》后记.....	(169)
《荒》后记.....	(170)
《蜕变》后记.....	(172)
《鱼儿坳》后记.....	(174)
《冰心著作集》后记.....	(176)

《心字》后记.....	(178)
《鲁彦短篇小说集》后记.....	(182)
《大姊》后记.....	(184)
《伊达》后记.....	(187)
《碑下随笔》后记.....	(189)
《还乡杂记》后记.....	(193)
《热情的赞歌》序.....	(195)
《胡絮青画集》前言.....	(197)
《冰心传》序.....	(200)

第五辑

《脱洛斯基的托尔斯泰论》译者志.....	(205)
《茶房也是一个人》译者附识.....	(207)
《我底自传》译本代序.....	(210)
《草原故事》小引.....	(213)
《秋天里的春天》译者序.....	(215)
《门槛》前记.....	(219)
《夜未央》后记.....	(221)
《战士杜鲁底》前记.....	(223)
《叛逆者之歌》前记.....	(226)
《我的生活故事》前记.....	(227)
《迟开的蔷薇》后记.....	(229)
《散文诗》后记.....	(231)
《快乐王子集》后记.....	(234)
《狱中二十年》后记.....	(238)

《六人》后记.....	(241)
《蒲宁与巴布林》后记.....	(245)
《回忆契诃夫》后记.....	(247)
《回忆托尔斯泰》后记.....	(248)
《回忆布罗克》后记.....	(251)
《回忆屠格涅夫》后记.....	(253)
《一件意外事》后记.....	(255)
《木木》后记.....	(258)
《处女地》(新版)后记.....	(260)
《父与子》(新版)后记.....	(263)
《往事与随想》后记(二)	(268)
《巴金译文选集》序.....	(270)

第六辑

《革命的先驱》(广告).....	(277)
《俄国虚无党人运动史》(广告).....	(278)
《卖鱼者的生涯》(广告).....	(279)
《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篇)》(广告)	(280)
刊行“文化生活丛刊”的缘起.....	(282)
“文学丛刊”(广告).....	(284)
《俄国社会运动史话》(广告).....	(285)
《回忆录》(广告).....	(286)
《狱中记》(广告).....	(288)
《草原故事》(广告).....	(290)
屠格涅夫选集(小说六种)(广告)	(291)

《夜未央》（广告）.....	（294）
《死之忏悔》（广告）.....	（295）
《告青年》（广告）.....	（296）
《万人的安乐》（广告）.....	（297）
《悬崖》（广告）.....	（298）
《柔蜜欧与幽丽叶》（广告）.....	（299）
《憩园》（广告）.....	（300）
《快乐王子集》（广告）.....	（301）
《狱中二十年》（广告）.....	（302）
《安娜·卡列尼娜》（广告）.....	（303）
《六人》（广告）.....	（304）
《春潮》（广告）.....	（306）
《文学回忆录》（广告）.....	（308）
《亚玛》（广告）.....	（309）
选编后记.....	纪申（311）

第一辑

书

在大街上几家古本屋里耽搁了两个钟头，抱了十多本《现代日本文学全集》出来，这里面有森鸥外，岛崎藤村，有岛武郎，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志贺直哉和别的一些文人。金1圆50钱也。确实是很便宜的罢。上了自动车，心里还颇高兴，因此又想起了一件事情。

离开上海的前两天，无意间买了一本美国版的《沙宁》，是有插图的大字本，而且是作为新书买来的，价3圆。我觉得很便宜。不过据一个朋友说在别的书店去买，也只要花这样的价钱。就是这同样的书，北平北京饭店内的法文图书馆的伙计曾向我讨过20圆的高价。相差得这么多！书贾们的赚钱的欲望也就大得可惊了。我并没有听错话，因为说话的是中国人，而且同去买书的还有我哥哥。结果那天我花去4圆买了一本“现代丛书”版的，译文是一样，却是没有插图的小字本。这种版本在别处只售价3圆的事情，我并不是不知道。

在上海红鸟书店买法文书也会常常遇到这种情形。有一次我要买一本小册子，大概是在巴黎公社殉难的Varlin氏的

纪念册罢，原价2个法郎，以为花四五角钱，就可以了。问那位中国伙计，他却毫不客气地向我要2块钱。他的那副吃人的面孔和声音就把我吓跑了，以后我几乎不敢再进这书店去。过了几天我有一次路过环龙路，又记起了那书，终于壮了胆子走了进去，这一次遇见的是一个法国人，结果付了8角大洋把小册子拿走了。这样看来外国商人的贪心远比那给他帮忙的中国伙计的贪心小一点罢。而在外人卵翼下做奴隶的中国人对于同胞的那种气焰，也就够叫人齿冷了。

在中国西洋书店里这种情形是很普通的。邮政局是衙门，早有人说过。西洋书店是衙门也是真的事情。从前连商务印书馆也仿佛摆过衙门的架子呢！现在大概是改良了。还有，在中国我很少到大的商店里去买东西，因为我走进那些地方，就好像进了衙门去递呈文。这心情我在法国，在日本却没有感到。

这些话似乎离题太远了。我应该回转来说说图书馆的事情。在中国假若有一个完备的图书馆，我们也就可以少受书店伙计们的闲气了。譬如倘使北平图书馆有一本英译本的《沙宁》的话，我也不会像朝耶路撒冷似地在各西书店去寻求这本书了。我不妨明白地说一句话罢，北平图书馆作为一个装饰品，是无愧的。而作为一个为人民设备的图书馆，那就完全放弃它的责任了。一般人不需要的那样堂皇的建筑在那里是有的；而一般人需要的普通的书籍在那里却常常缺乏。我找过E. Zola，找过H. Ellis，找过E. Carpenter.....，他们的重要著作却没有一部。我更可以夸张地说，我要读的书，那里全没有。我为了找书不知道白跑了若干次，但如今北平图书

馆却以“为国家搜集善本书的责任”自豪了。事实上像那用1800圆的代价买来的《金瓶梅词话》对于现今在生死关头挣扎着的中国人民会有什么影响呢？难道果如那些文化膏药式的学者所说一民族的存亡全系于文化，而文化的精华就在于这般“古董”么？

自动车走过海边的一站停了，我望见一只刚开出的轮船。这轮船是往中国去的罢。我不觉把眼睛抬得高高地往西边看。

〔附记〕 听说北平图书馆方面发表了答复我的文章，可惜我没有机会读到。一个朋友写了文章为我“声援”，这也近乎多事。又一个做过北大教授的朋友对我说：左拉的书那边有，曾有一本法文目录寄给他。这当然是真话。不过在馆内的目录里却查不着，我要看也无法看了。至于霭理斯的七卷《性心理》，加本特的《全集》等等，我查了好几次目录，都没有查着，也许这种书是有的，只是不做教授的我们不配看罢了。我应该道歉，因为我以前不明白文化城里的图书馆的特别的使命，现在明白了，所以人也就变聪明了。

写于1935年。

选自《巴金全集》第十二卷第467页。